第一章　作战方式变革的动因

统领 20 世纪战争舞台的机械化战争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辉煌，已经像燃烧殆尽的落日，夕阳西去；信息化战争犹如刚刚刺破黎明的霞光，给 21 世纪空、地、海、天一体化的战场撒下色彩纷纭的新景象。当今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和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实践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信息技术的发展必将导致武器装备发生划时代的变化，进而导致作战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作战方式的变革，既是战争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军事革命发生质变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又是影响其发生转变和质变的主要因素。军事革命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到作战理论、作战方式、武器装备和编制体制等具体事物的革命性变化上。

作战方式泛指作战形式、样式和方法。主要包括战役战斗的表现形式、基本样式和组织实施战役战斗所涉及的指挥保障等各方面的方式方法。作战方式由战争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变化，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促使作战方式变革的物质基础，战略需求和战争实践是牵引和推动作战方式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技术进步推动作战方式的变革

科学技术划时代的进步，必然使作战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推动作战方式变革的根本动力。作战方式的形成与变革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历史上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必然带来一个作战方式变革的活跃期。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作战方式的变革之间，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过程，即科学技术进步应用于武器装备的发展，进而推动作战方式的变革；在军事实践中，作战方式又对军事技术提出新的要求，并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再进一步推动作战方式的变革。恩格斯曾精辟论述过科学技术对作战方式的影响，他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战争史和人类科学进步史也揭示了这一真理。

人类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作战方式，就源于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不同石制工具为武器，进行狩猎时所形成的组织活动方式。磨制石器工具也正是人类科学技术产生的第一道曙光，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滥觞。原始社会，围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反映在各部落之间偶尔发生的一些冲突中，狩猎的棍棒、石块就是武器，“作战方式”表现为如同人兽搏斗一般的个体搏斗和群体混战。当时的信息手段仅仅局限于肉眼观察和声音呼号。在相互对打过程中，己方战斗成员之间主要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现场情况，自行判断、自我决策、主动配合。比如，当发现己方成员被对方成员围打时，主动前去帮助营救，或以大

声呼叫提醒己方成员身后有人来袭，迅速避开或采取应对措施。当时的作战如同围猎的方式一样，是一种以战斗成员本能的自协同为主的形式。

人类在经历了漫长的狩猎、采集野果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后，不知哪位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先人，偶尔发现并认识到植物的种子在春天播下，秋天可以收获数十乃至数百倍的果实。可能正是这一发现，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命，人类进入了漫长的农业社会阶段。冶炼技术的发明、畜力的驯化和利用，使农耕生产的技术手段、方式方法运用在作战中，随之出现了冷兵器和车、骑、步相结合的作战方式。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击鼓、鸣金，快马、狼烟等，成为当时指挥协调部队作战的主要通信手段。在此基础上，为了把弓箭兵、盾牌兵、长枪兵等操用不同性能兵器士兵的战斗效能形成更大的整体力量，便出现了用以单兵之间相互协同的“阵”。“阵”这种作战组织形式，把每个不同功能的士兵应发挥的作用及其相互协同的关系，通过各种阵形的方式固定下来，在战斗中以击鼓、鸣金、挥旗等信号，实施统一的指挥控制，达成协调一致的行动。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水平低下，用于作战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军队机动工具主要靠人力或畜力，因此，作战方式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度，由于生产方式和自然环境的不同，作战方式也不一样。在我国实行“井田制”的春秋时期，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战役战斗样式是以车阵为核心的野战攻防；战国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破坏，步战逐渐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战役战斗样式及战法是各种以步阵为中心的野战攻防；秦汉以后，随着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的兴起，以及封建生产方式多元化的产生，骑战才逐渐上升

到主要地位，至蒙元时期骑兵和骑战达到了鼎盛时期，军队可在比较广阔的战场上进行大纵深的机动作战。伏击、诱击、正面突击、奇袭、迂回、包围、远程奔袭以及大纵深的出击与退却等作战方式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在欧洲大陆，由于其生产方式的不同，海产业、商业、海运为其主要经济支柱，因此，其作战方式中海战及海陆配合的战役战斗多于陆战，其陆战的作战方式主要是步兵方阵、骑兵方阵的野战攻防。火药发明并传到欧亚后，对其作战方式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使原来密集的“阵”式交战变为宽正面、浅纵深的“线式”交战。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种新式武器装备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无烟火药发明后，各种弹仓步枪、机关枪、迫击炮、榴弹炮等速射火器迅速出现。发动机的发明和在军事上的应用，使内燃机驱动的装甲舰成了海军战斗威力的基础； 1895 年汽车问世，20 世纪初开始在陆军中装备；1915 年 8 月第一辆坦克样车——“小游民”坦克在英国问世；20 世纪初欧洲各国开始从事飞机制造，1910 年法国首先把飞机用于军事。 1915 年高射炮也随着飞机的使用出现于战场。同年 4 月化学毒剂首次用于战场。 1897 年马科尼发明的无线电报机，到 1901 年其通信距离达到 4800 多千米以上，并已用于军事。由于上述武器技术装备的陆续出现并用于战场，坦克兵、航空兵、防化兵、高射炮兵等新兵种相继产生，为合同作战方式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战斗的实践，使人们清楚认识到，只有在组织形式上按一定比例把诸兵种合成为统一的整体力量，按照目标、时间、地点协调一致地实施作战行动，才能赢得战役战斗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 年秋的康布雷战役，英军以坦克引导步兵，

在炮兵的徐进弹幕射击和飞机的支援下，向德军阵地实施冲击；突破后，以航空兵火力突击德军步兵群，以炮兵火力支援步、坦连续攻击，经过 10个小时的战斗，英军突破了德军的战术防御。此次战役十分清楚地显示了各兵种协同动作的作用，它成为合同作战方式形成的重要实战标志。

作战方式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战争领域的客观反映。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小生产方式被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社会的生产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为人类从事战争制造出许多性能更优越，技术含量更高的不同种类的武器装备。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社会生产中的明细分工在作战中也直接反映出来，出现了诸多专业技术兵种，诸如主要实施机动突击的装甲兵、遂行火力支援任务的野战炮兵、专门遂行运动保障及反敌机动任务的工程兵、负责通信保障的通信兵等。作战方式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现代意义上的诸兵种严格分工协作的合同作战应运而生。如同社会生产中的机械化流水作业一样，诸兵种严格按照预先制定的战斗程式，环环相扣，节节相连，同步协调地进行合同作战。而协调控制这种流水线式合同作战的主要信息手段，就是有线电和无线电通信。当有线电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满足当时的战术层次协同作战的需要时，也就是电话作为基本通讯工具在战斗中得到广泛应用，合同作战的组织形式首先在战斗层次得以实现。而在战役上，由于当时无线电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有线电技术还不能满足远距离、大范围、不同战场、不同军兵种间组织协同的需要，所以，直到无线电通信技术有了较大发展，解决了空空之间、空地之间、空海之间及陆空海之间协同、指挥、控制的联络问题，合同作战才在规模宏大、战场广阔的战役层次上得以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武器装备和军兵种的进一步发展，合同作战方式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纵观战争发展的历史，科学技术决定生产方式，也是推动作战方式变革的根本动因。

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必然推动作战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决定生产方式的第一要素。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必然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也必然使作战方式发生与信息时代的生产方式相类似的变革。而且，这两种变革从本质上看，都是一种划时代的变革。工业革命改变了农业社会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典型的特征就是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一个大而全工厂从生产各种零部件，到一部机器的组装，各个环节流水作业，就像一部机器一个齿轮连接一个齿轮的运转。这种工业机械化大生产的特征反映在作战中，一是大而全的合成军队，自身功能齐全，便于在某一地区、某一方向上遂行大兵团独立作战；二是预先摆兵布阵，在几十或上百千米的正面、纵深内，建构一个相对固定的、犹如机械化大生产的工厂一样的作战部署；三是把诸军兵种按照相对固定的作战程序区分为前沿、纵深、后方，一梯队、二梯队、预备队等，排成长长的“流水线”，依次投入交战。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信息网络的发展使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其生产方式正在发生相应的变革，地域性的、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方式将被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广域联合大生产方式所取代。信息化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建立在信息网络技术基础上的市场需求和宏观调控下的全球化生产和经营模式。一个真正实现了信息化的、面对世界市场的企业，是建立在信息网络技术基础上的、在总体计划和宏观控制下，按照统一标准和协议，实施网络链接下的、广域分布的自组织、自协调的联合化生产和销售体系。比如一些跨地区、跨国度的大公司，在信息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其生

产网络遍布全球，既可利用世界不同区域的资源和市场优势，又能通过网络进行协调调度和生产经营的管理，本土公司就如同一个联合指挥控制中心。催生这种广域联合大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关键在于信息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信息化时代的生产方式反映在战争领域，首先是打破了地域性和时序性限制的“非接触”“非线式”作战成为重要的作战方式。

超视距打击应属于工业时代和机械化战争的最高成果，但真正使作战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是信息技术作用下的超视距精确打击。在以发动机为标志的工业技术条件下，火炮、导弹、飞机等，也可以打到视距以外的目标，但由于不能实现精确打击，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的大规模空袭都达不到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的空袭效果，因此，主宰战争胜负的还是视距内的作战方式。

在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战场的情况下，从情报侦察、目标定位、指挥控制到效果评估，都可以达到非常精确，作战方式的精确化特征日趋突出。全方位、全天候、全频谱的高技术侦察系统，能够为指挥员全面、实时地掌握战场情况提供可靠依据。先进的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可以自动显示目标的三维坐标、运动速度和准确时间，提供精确度很高的定位信息。在 C^4IKSR 系统的支持下，信息主导下的精确打击技术和兵力火力多维机动能力不断成熟和提高，并逐步扩大超视距精确打击规模和机动空间。一方面，信息化武器装备能够超越敌方作战部署，直接打击敌方纵深内目标，通过重点打击对方的侦察预警、指挥控制和防空系统，瘫痪对方的整个作战体系，就能摧毁对方的作战能力和抵抗意志，达成作战目的，因而，“非接触”作战方式逐渐要取代“接触作战”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信息主导下的机动和超视距精确打击相结合，将使“非线式”作战成为全维联合作战的主要方式。美

军强调：“当技术和作战理论扩展了作战行动的杀伤力、节奏和纵深时，也提高了常规部队实施非线式作战的能力。”① “全维的联合战役在主要方面是非线式的。也就是说，空中、海上、空间和特种作战的主导作用可能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地面部队的战线。”② 由于实施非线式作战，要求各部队从多个基地沿多条作战线同时发起作战行动，因此，基于信息技术的战场感知能力、指挥控制能力，以及机动、火力和保障优势，是确保部队行动自由和安全的基本条件。

信息技术和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发展为作战方式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技术的进步、武器系统战斗效能的多能一体化，是作战方式变革的物质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正促使武器系统在性能上由单一作战效能向多功能一体化方向发展。合成军队概念将由于技术的进步被直接“固化”到武器系统之中。以往作战中，一个合成战斗编组要求同时编有坦克兵、步兵、炮兵、防空兵、通信兵、防化兵等诸多兵种，现在一个高技术武器系统或作战平台，自身就都具备了战场机动、突击、火力打击、战场防护、对空作战、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等多种战斗效能。未来一个兵种的战斗效能已不再是只局限于某一专业技术领域，每个独立的军种、兵种都具有相对全面的战斗效能，都能相对独立地遂行战役战斗任务。诸兵种的兵力兵器合成将走向武器系统多种战斗效能的技术合成，这就为小型化、模块化作战编组和联合作战行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信息网络技术是未来作战协同方式变革的关键。信息网络化技术是在立体广袤战场上，多军种间实施联合作战的技术支撑。就像当年无线电技术的发明和有线电通信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使得军队在有限

①美军《联合作战纲要》， 2001 年版。
② 美军《联合作战纲要》，1993 年版。

的战场空间上实施统一的指挥与控制变成可能，因此，人们关于战场上多军兵种、多力量要素按照统一的步调密切地协同配合，以形成整体威力的想法变成了现实。然而，在信息化战场上，战场变化节奏明显加快，如果再遵循合同作战中统一指挥与控制的方法，采取由下而上地逐级报告情况，再由上而下地逐层下达指令，必然延误战机，造成被动挨打局面。而信息网络技术所带来的各军兵种之间、各部队之间战场信息实时共享，各军兵种、各独立的战斗编组在多维一体化战场上，不仅了解自己局部的战场情况，也能统揽战场全局，能够也应该根据实时的战场情况变化，借助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迅速地做出判断、决策和行动，实现相互之间的适时、主动协同。这样，一种形式上更宽松，但协调程度更高的协同作战方式不仅需要，而且也能够变成现实。各作战单元能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协同，主动协同，以适应信息化战场对时间、速度的要求。

作战协同单元的变化推动着作战组织形式的变革。在未来战场上，单一的陆上力量、空中力量或海上力量，都难以独立于其他军兵种之外遂行作战。无论是战役还是战斗，作战行动都将是由来自多维战场空间的诸多军兵种力量共同遂行。随着信息技术和武器性能的发展，监视与侦察系统的探测距离越来越远，武器系统的射程也是如此，部队控制的区域和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因此，各军兵种作战空间的重叠区域将越来越大，最终将合为一体。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打破传统的军兵种分工，走向完全一体化的多军兵种参加的联合作战。以不同兵种为主要协同单元的协同作战时代行将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以多军种间协同为主的协同作战。

综上所述，现实需求与科学技术进步的统一，使作战方式的变革成为可能。一种基于信息技术支持，能够实时共享战场信息，在联合指挥

机构的统一计划、协调和控制下的小型化、功能模块化的联合编组的诸军兵种，以“形散实联”的结构方式和部署形式，根据联合指令适时投送或快速机动投入交战，依据战场情况、遵循统一原则、按照计划协议要求并行作战，随机协同和主动配合，真正实现传感器与武器平台之间、各军兵种之间、各种作战行动之间的无缝衔接，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诸军兵种的整体作战威力的作战方式，将是作战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预期目标，它将伴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应运而生。

二、战略需求牵引作战方式的变革

原苏军元帅索科洛夫斯基在他主编的《军事战略》一书中指出：战略是“在研究以往战争经验、军事政治形势、国家的经济和精神力量、新式武器和预想敌人的观点和力量的基础上，探讨未来战争的条件和性质、准备和进行未来战争的方法、各军种及其战略使用原则、物质技术保障原则、战争指导原则和军队领导原则。”可见，正确的战略指导来源于对本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分析和判断，通过“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来指导战争准备和战争实践。因此，作为战争准备和战争实践的重要内容——进行战争的作战方式必须与战略需求相适应。

战略对战役、战术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它为作战方式的变革指引着方向。战争形态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当主客观条件趋于成熟时，旧的战争形态必然被新的战争形态所取代。而大量的历史遗憾告诫我们，每当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初露端倪或刚刚诞生时，往往人们的战争观念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里，被传统的惯性拖向

已经变化了的战争。技术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更新，只是为新的战争形态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真正被人们认识并付诸实践，最终还要靠人的认识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和新理论、新体制、新战术和新作战方式的确立。这种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变革的早晚则取决于人们认识的先后。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军事革命，它具有一种不同于以往军事革命的特性，即科学技术越是发展，军事革命及其作战方式的变革就越具有可预测性。正在进行过程中的这次新军事变革，早在初露端倪之时，人们就敏锐地洞察到发生这场革命的必然性，并进行研究和规划，主动地进行战略调整，积极推进军事变革。近 30 年来，世界范围内大的军事战略调整主要有两次，这两次战略调整都是基于战略格局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具有前瞻性的新理论引导下进行的。第一次是冷战格局下的战略调整，由核大战战略逐步调整为高技术常规战争战略。美国战略理论家泰勒在《不定的号角》一书中，首先提出改变核大战的战略思维。其后，柯林斯、基辛格等著名战略思想家相继提出了新的战略理论，促进了美国的军事战略调整。美国先后出台了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低强度战争战略等新的战略。第二次是冷战结束后的战略调整，由机械化战争形态下的军事战略向信息化战争形态下的军事战略转变。布热津斯基、沙利文、佩里、马歇尔、欧文斯等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构想，促使美国在上世纪 90年代形成了“塑造、反应、准备”的新战略。军事战略的调整，必然要求军队编制体制和作战方式与其相适应。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美军相继提出了信息作战理论、空间作战理论和新联合作战理论，并把这些理论成果吸收到新的作战条令之中，运用于战争实践，出现了超视距远程打击、精确打击和非线式、非接触、非对称作战等新的作战方式。在新战略思想的牵引下，美军不断地进行超前设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设计未来战场、设计未来作战方式。1995 年，美军就出台了《2010 年联合构想》,之后不到 5 年时间又抛出了《2020 年联合构想》,充分体现了战略指导的主动性和理论牵引的超前性。

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战略需求的驱动和战略主体的选择决定着作战方式变革的进程和结果。作战方式的变革是物质和意识相结合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坦克、飞机已经用于战场并显示了在作战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但欧美一些主要国家在战略预测和战略指导上没有认识到这些新的武器装备将给作战方式乃至战争形态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看不到机械化战争即将来临，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墨守成规，沿袭过时的作战方式，造成了战争初期的被动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面对类似凡尔登战役“绞肉机”式的坚守防御，当时“战术上的难题是部队怎样以较少的伤亡穿越火力控制区，战役上的难题则是怎样使成功的穿越火力控制区在战局中具有决定性意义。”① 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德国人，早在 1918 年“最先发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但是他们缺乏将理论变为有效行动的手段。”战后,德国迫切地为其侵略扩张战略寻求军事手段，正是这种战略需求将闪击战理论与内燃发动机技术的有机结合，使作战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此时，法国军队还把一战时期的坚守作战奉若制胜的法宝，在消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把宝贵的时间和人力物力资源用在了修建比“凡尔登”更坚固、更宏大的“马其诺防线”上。美军在海湾战争后给国会的报告——《海湾战争》一书中讲到：“对新武器作用理解较深的一方，比拥有同样质量和数量的武器，但使用武器的理论略逊一筹的一方，拥有更大的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对坦克、飞机等新武器的

① 《未来战争》,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作用还缺乏较深的认识，战略指导落后于已经用于军事领域的科学技术水平，在消极防御战略指导下，以阵地防御、阵地持久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战场上，新武器的机动速度、火力突击等优势受到作战方式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的胜利，正是由于他们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比其他欧洲国家军队“对新武器作用理解较深”，率先以闪击战的理论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方式，真正把作战方式推进到了充分发挥机械化部队的机动、突击能力，实施纵深、立体交战的时代。这种变革，并非一味地强调技术上的变化，仅仅是充分利用了当时已经成熟的、而且是对手国家都拥有的技术，关键在于他们把战略需求与技术途径有机结合，使组织体制和作战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像美国的约翰·阿奎拉、戴维·伦菲尔德等合著的《决战信息时代》一书中所讲的那样：“从根本上说，闪击战并没有发展任何新的决定性技术，只是通过新的作战理论和组织结构将装甲部队、战术航空兵和无线电通信结合到了一种新的系统中。”

《战争科学》一书的作者利德尔·哈特认为，“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总是比行动上的错误造成的损失大。”同时，他坚信战略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对如何指导未来战争得出正确的结论。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诫人们，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只是为作战方式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革命（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科学的，或是军事的）从其定义上来说，意味着改变和发展的中断。军事革命是军事能力和军事效能跳跃式的增长，区别于军事能力正常的演进性增长，无论这种增长是由于使用了新技术还是战法革新的结果。军事革命并不只是一个存在的条件，如果不去认识和利用军事革命（两者都必须发挥人的作用），也就没有军事革命。因此，进行一场军事革命并非只是推动新兴科技的发展，或是突破原来

的军事体制的界线；它必须是一项最积极的活动，要求进行相应的组织机构改革，以利用军事革命的成果。’[①] 然而，这种改革必须以战略上的正确判断和决策为前提。作战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是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和具体表现，不摆脱传统战略思维的束缚、不打破旧的组织形式和运行体制，新的作战理论和作战方式就建立不起来。据史料介绍，当年闪击战的产生，在德军也经历了艰难而激烈的斗争。闪击战理论的确立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实施的作战方式变革，曾遭到了来之德国陆军阶层的强烈抵制。尽管“正是由于有了革命性的创新，从根本上改变现有作战模式才有了保证’[②]；尽管这种创新和变革会带来巨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但改革必然要冲击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组织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重组必然打破原有的平衡，并因触动方方面面的利益而招致反对。因此，往往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越是具有革命性变化式的改革，它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在上次战争中遭受失败打击的军队，往往变革的动力大于阻力。相反，在上次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一方，往往更难以摆脱传统战争观念和战略思维的束缚，保守的阻力可能大于改革的动力。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欧洲其他参战国的经验和教训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战争的政治目的也决定着战争手段的选择，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军事战略规定着进行战争的作战方式。战争历史，包括近期各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本质的论点是不可动摇的。他说：“战争并不仅仅是政策行为，而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的继续。……决不应该把战争看成是自发的一件事，而是总要看成是政策的工具。”新军事变革既是技术

① 《决战信息时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② 《决战信息时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推动的历史必然，又是由政治目的决定的现实和未来需求。作战方式服务和服从于战争的政治和军事目的，作战方式的变革也必然受到政治目的和军事战略的制约。

当年“闪击战”的作战方式之所以产生在德国，而不是英、法等国家，这与他们进行战争的政治目的及其服从于政治目的的军事战略有着直接的关系。德国作为后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甘心世界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被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瓜分殆尽的现实，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是要重新瓜分世界。但其处在法国、苏联的挟制之下，军事上与其相比处于明显劣势，经济上也难以支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的要求，在战略指导上必须选择速决战。因此，适应速决战思想的“闪击战”作战方式就应运而生了。英、法等老牌的帝国主义则不同，他们出于维护现实利益的政治目的，加之背上了上次战争的经验，在战略指导和作战方式上必然更重视防御。因此，尽管富勒、利德尔·哈特、戴高乐等在研究坦克的运用理论和作战方式的变革方面大有建树，但不仅没有引起本国最高军事当局的重视，反而遭到抵制和反对。时至 1935 年，法国国防部长罗·雷诺要求组建装甲兵部队，仍遭到军、政界头面人物的坚决反对。反对者坚持认为，现代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组织强有力的防御，而不是进攻。英国也从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目的出发，为避免卷入欧洲的地面作战，认为发展强大的海空军力量就可以保卫岛国的安全，直到 1940 年才开始组建装甲师。当年的英、法等国并不乏机械化战争和作战方式变革的先驱者，其坦克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也都优于德国，但由于政治目的和战略指导限制了军事理论、作战方式的发展和变革，导致了战争初期的严重挫折和重大损失。

当今美国积极抢占军事革命的制高点，就是要在 21 世纪人类社会

政治经济环境下，寻求一条以新的战争手段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政治目的。两次大战的结果使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认识到，机械化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难以达成战争的政治、经济目的。为了获得最佳的战争效益，他们企图利用新的技术和理论创造新的作战方式，以求达到既实现预定战争目标，又能对战争强度、战争时空、战争进程进行有效控制。有效地控制战争，是工业时代战争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人类进入 20 世纪以后，机械化战争规模的急剧扩大，战争消耗的愈加庞大，战争伤亡的显著增加和战争破坏力的迅速膨胀，并伴随着核武器的威胁和核大战的危险，使包括霸权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有效控制战争手段、战争时空并进而控制战争进程，尽量减少战争伤亡和破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在探索和尝试用一种新的、更加可控的技术手段和方式来实施作战和进行战争，以达到对战争的有效控制，从而避免或消除工业化战争特别是机械化战争的固有弊端，实现人类战争形态和方式的根本性改变。这种尝试，通过作战技术形态信息化、军事手段高技术化等方面的加速发展，已经初见成效。可以预测，像两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机械化战争那样对生产力产生巨大破坏和对人类文明形成空前毁灭的战争将逐渐退出战争舞台。为探求新的战争和作战方式，以保持在未来战争舞台上的优势地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依据客观环境和主观需求积极主动地进行战略调整。无论是“灵活选择和参与”战略，还是“塑造、反应、准备”战略，都力求充分利用信息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成果，通过军事技术的进步和武器装备的更新，创新作战方法，改革军队组织结构和编制体制，建立由信息等新的要素构成的并以新的方式使用的新的军事力量体系，以最终实现对战争手段、战争时空和战争进程的有效控制。

新军事革命“是在人的领导下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实施新军事革命就是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指导特定的作战行动。”① 在 21 世纪的一定时期内，将是传统的机械化战争与信息化战争并存交替的过程。信息技术用于机械化战争的作战方式，战争的破坏性将会更大。使用大规模毁伤武器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威胁将迫使一些国家执行比较慎重、明智的军事政策，并积极探索所谓“人道主义”的战争手段。因此，在战略指导、战争准备和实施的过程中，基于信息和信息技术的低强度、高技术，低毁伤、高效益的作战方式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战略思维、战略决策和战略选择的对抗性，决定着作战方式选择的灵活性和非对称性。战争是敌对双方对立和对抗的最高形式，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展开的较量。建立在一定物质技术基础上的战略决策层的心力与智慧的较量，必然要反映在战役、战术作战方式的灵活性上。战争历史证明，当“矛”可以刺穿“盾”的时候，就预示着“盾”可能要发生一次重大的进步甚至是一次质的飞跃。同样，当“盾”的发展足以抗击“矛”的攻击时，“矛”的新一轮发展又已开始。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长罗伯特·斯格尔思说：“每一个主要的军事优势最终都会产生与之抗衡的反应。美国用了 50 多年的时间才有了目前的军事优势，这是他将技术革新和工业能力转化为有效的战场优势这样一种非凡能力后得来的。这种军事优势越来越依靠精确地使用弹药的杀伤力来体现。不幸的是，善于创新的敌人会形成一种战争方法，试图击败我们在战争科学和精确武器使用的独霸局面，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② 他认为“在非西方世界中许多国家一直寻找击败西方火力优势的方法”。他提醒“美国人也不应忘记，按照毛泽东思想创立的中

① 《决战信息时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② 《未来战争》，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